

日本文化人写真

聚焦中日文化交流

刘德有 著

中岛健藏

团伊玖磨

野间宏

辻井乔

平山郁夫

增田涉

清水正夫

野村万作

浅利庆太

真山美保

室伏香云

柳田泰云

古井喜实

千宗室

白土吾夫

井上靖

有吉佐和子

川端康成

内山嘉吉

竹内实

松山树子

花柳千代

山崎朋子

栗原小卷

藤木俱子

安原皋云

丸木俊

香山健一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日本文化人写真

聚焦中日文化交流

刘德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日本文化人写真: 聚焦中日文化交流 / 刘德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39-5451-1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中日关系—文化交流—

文化史—文集 IV. ① K203-53 ② K31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7537号

日本文化人写真

聚焦中日文化交流

著 者 刘德有

责任编辑 董瑞丽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875

字 数 1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451-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卷首絮语



一本书通常卷首有一篇“序言”，本书的卷首不是“序言”，而是“絮语”。既然是“絮语”，难免要多啰嗦几句。说些什么好呢？我想，就从本书的书名《日本文化人写真》说起吧。

“日本文化人”这个题目实在太大，怎能做到涵盖全面？实际上做不到。本书介绍的是我过去接触和认识的众多日本文化人中的仅仅28位。不消说，“挂一漏万”是肯定无疑的了。即使是这28位，我的秃笔也只能反映他们在日中文化交流中所做贡献的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如今我坐在电脑前操作键盘写这篇《卷首絮语》时，在我眼前又浮现出我熟悉的日本文化界那些可敬可亲的一张张面孔，是他们与中国人民一道，长年坚持不懈地、默默无闻地填满着政治、经济所不能填满的沟壑，运用艺术手段和语言使人们沟通情感，润泽心灵，垒起中日友好的坚固基石，也使人们去思考怎样去构筑和谐的亚洲与世界的美好家园。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歌舞伎表演艺术家河原崎长十郎先生，也许很少有人

知道他是日本一位最早投身日中文化交流的人士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1952—1953年间),作为“前进座”负责人的河原崎长十郎,就在日本演出过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当时不像现在,一般的日本人对新生的中国不甚了解,而且根本不知道“屈原”是何许人也,但是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了解了屈原。河原崎长十郎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见,文艺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河原崎在演屈原时吸收了日本歌舞伎的许多“元素”,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位中国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1952年,日本刚刚从战败的废墟中走出来,很多演出场地由于在战争中被炸毁,成为断垣残壁,有时下雨天不得不借用学校的操场,铺上草席演出。那时的观众都是住在场地附近的老大爷、老大娘,他们看到剧中的南后郑袖虐待婵娟、施展阴谋,就怒不可遏地向台上扔桔子,边打边骂郑袖:“你这个坏女人!”那情景颇似早期在中国农村演出歌剧《白毛女》。

20世纪60年代中期,河原崎长十郎酝酿在日本再次演出《屈原》。当时,我在日本做记者,深知河原崎先生实现这一愿望困难重重,他要四处奔波,寻找支持,筹集款项,挑选演员,整理剧本。1972年3月,河原崎先生主演的《屈原》在东京都市中心大厅拉开了帷幕。河原崎长十郎先生不愧是一位名演员,他的演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做工,还是道白,都有独到之处。可以说,他把屈原演活了。郭老为了表示祝贺,用毛笔写了一首诗:

滋兰九畹成萧艾,
桔树亭亭发浩歌,
长剑陆离天可倚,
劈开玉宇创银河。

《屈原》除在东京外,还在日本二十几个城市进行了巡回演出。就在这次巡回演出的过程中,1972年9月迎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八

年后的1980年11—12月，河原崎先生率团来华，在天津、南京和北京演出了《屈原》，这是他第一次把郭老的历史名剧搬上了中国舞台。

说到早期的文化交流，我还想起一位日本书法家丰道春海老先生（别号天门海翁）。1964年7月，87岁高龄的丰道老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我在展览现场亲眼看到丰道老先生把纸铺在地上，使用如椽大笔挥毫的动人情景。丰道先生还专程到郭沫若先生府上拜访，以表示敬意。郭老在书赠丰道春海先生的题词中写道：“日本在隋唐时代与我国深入接触，采用汉字为其文字之根源。书法亦因而会通。平假名结构大有二王笔意，欣赏天门海翁书者可知余言之不谬。”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中日文化交流在发展过程中，其形式也不断创新。日本歌舞伎男旦大师坂东玉三郎“吴侬软语”念唱演出昆曲《牡丹亭》，在中日两国传为佳话。我第一次在东京见到坂东玉三郎是1998年4月。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修长，眉目清秀，谈吐儒雅，整体的感觉是静、美、雅，不愧是歌舞伎男扮女装的名角。我当时为他作了一首“汉伴”：

一见不寻常，
举止窈窕似女郎，
何需着戏装？

坂本对中国戏剧情有独钟，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十三世守田勘弥早在1926年便与访日的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同台演出过，从小就深受其熏陶的他，一直喜欢中国。2007年，坂东玉三郎在苏州观看了昆曲《牡丹亭》，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便开始向昆曲大家张继青学习杜丽娘一角。对于一个完全不会中文的外国人来说，学唱昆曲，谈何容易？！然而坂东学得非常认真、执着。他说，他最大的困难是念白。他认为要用苏州方言念台词才算正宗，才有味道。坂东把剧本全部标出音标，跟着老师张继青灌录的唱词和念白以及她录制的口型强行记忆，反复练习。经过近

两年的努力，终于于2008年3月在日本京都演出了中日版的《牡丹亭》，获得巨大成功。同年5月，他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在他的偶像梅兰芳曾演出过的湖广会馆向中国观众展现了他尽显昆曲唯美浪漫的非凡的艺术才华。

说到执着和坚持不懈，我不能不提到一位日本文化界的老朋友，他就是“乐戏舍”负责人津田忠彦先生。他本是一位话剧导演，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带着他导演的描写鲁迅留学日本生活的话剧《藤野先生，再见！》来北京演出。后来专门从事邀请中国各地的京剧团到日本巡回演出的工作。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内只邀请三次、五次则并不稀奇，但他从1986年开始到2010年，排除万难，一年一次连续邀请了25年，而且每一次都邀请知名度高的剧团和演员，精选剧目，并根据日本观众的特点进行必要的加工，以获得最佳的演出效果。特别可贵的是，津田把这一活动冠名为“京剧青少年剧场”，让剧团深入到日本各地的初高中进行演出。通过面向青年学生，培养他们爱好京剧，从而更加关心中国。2004年12月，“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向津田忠彦颁发了“金菊奖”，成为获得该奖项唯一的外国人。

中日友好事业需要培养接班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同样也需要培养接班人，日本一些严肃的文化人正在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日本儿童剧著名演员伊藤巴子女士于1965年随日本几个话剧团联合组成“访中日本话剧团”来北京演出。她荣幸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戏剧界的朋友。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中日戏剧交流而奔波，并为此经常访问中国，与中国戏剧界人士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她现在出任日本“话剧人社”理事长。她说：“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今天，在通过戏剧加深双方理解的同时，我们面临一个……共同发展两国戏剧事业的课题。这些课题已超出我们这些民间人士的力量范围，我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然而我们必须坚持，将自己小小的力量汇集成一股迈入21世纪的更大洪流。”她说：“文化和艺术的交流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了打开对方的心扉，必须首先敞开自己的

胸怀。只有这样，彼此才能更加接近对方的心灵深处。”伊藤认为“有一件工作非常重要，虽然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却仍未完成，需要下一代继续努力。我们要将100年前开始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告诉下一代，教会年轻人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怎样以坦诚的目光正视历史，认识事实。时代不断地推移，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都需要正视历史。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便无法跟上21世纪的步伐，无法把握新时代的脉搏，一旦失去了‘历史’这一基础，日本与中国的友情和信赖关系便根本不可能存在”。伊藤女士的话讲得多好、多深刻啊！她的话代表着日本人民的心声。

尽管本书所介绍的日本文化人的活动领域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掘井人”，都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

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的文化交流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形势令人振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更为快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由于人类生活方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带来了思维方式和其他行为模式的改变。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世界性多媒体结构使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的扩展具有全球性，而且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这就使国家间的联系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大大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在这一新形势下，中日文化交流除了进行传统文化艺术的交流外，还必须注意现代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注意多媒体以及文化产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近几年，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现象“脱离”了人们原有的观念，带上了“非古典”、“非传统”的色彩。

文化交流说到底心灵的沟通，是感情的交流。文化交流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而相互了解才是友好的基础。只有相互了解，才能逐步消除隔阂和偏见。

有人说文化不是万能的，文化交流要经常受到“政治气候”的制约。是的，文化的确不是“无所不能”，但这只是说了问题的一面，事物还有

另外一面。在两国“政治气候”不好的时候，不是更需要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沟通两国人民的心灵，增进感情，促进相互了解吗？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关系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凝聚了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对于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去损害它。在中日关系进入全面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今天，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但我们要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始终不忘大局，努力使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人们希望中日关系能像狂飙过后天空出现的一轮明月。月亮有时也会被乌云遮住，但乌云一旦被吹散，那月亮就会显得更圆满、更明亮。

本书能在中日关系值得纪念的年份付梓问世，全赖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理解与大力支持。在此，谨向所有给予关心和鼎力相助的人士致以由衷的谢忱！

作者识

2012年新春于北京林萃公寓

卷首絮语·····	1
“海中的小岛便是我” ——记中岛健藏·····	1
生命之火不熄 ——记白土吾夫·····	9
“烟斗之烟”涌出文思的团伊玖磨·····	16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楼兰》·····	23
野间宏先生与小说《残像》·····	27
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	38
辻井乔与《桃幻记》·····	45
浅议川端康成及其作品·····	50
缅怀日本画坛巨匠平山郁夫·····	56
追怀内山嘉吉先生·····	63
发现鲁迅题字的《呐喊》和《彷徨》·····	72
《中国小说史略》与增田涉·····	76
竹内实先生与毛主席诗词的翻译·····	85
芭蕾舞剧《白毛女》与清水正夫·····	93
“狂言”大师野村万作的中国情结·····	101

花柳千代与舞剧《大敦煌》	112
浅利庆太与中国音乐剧	122
山崎朋子与话剧《望乡》	134
同对樱花醉几回	
—— 记真山美保	139
栗原小卷的表演艺术	149
室伏香云与“汉诗”吟咏	154
俳缘	
—— 我与俳人藤木俱子	160
笔墨传神总是春	
—— 记柳田泰云	169
第一个写毛主席诗词的日本书法家	
—— 记安原皋云	180
古井喜实与启功的墨宝	186
《原爆之图》作者、女画家丸木俊	191
茶道里千家掌门人千宗室	194
友谊·花束·21世纪	203

“海中的小岛便是我”

——记中岛健藏

■ ■

提起中岛健藏先生，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是1961年3月间，亚非作家会议紧急会议在东京举行，中岛先生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付出了很大努力，对出席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天，代表团副团长刘白羽和团员林林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先生的陪同下，拜访了居住在东京中野区的中岛健藏先生，因为需要翻译，我也陪同前往。

中岛先生和夫人京子热情地把我们迎到客厅，主人的盛情和亲切入微的招待，使我们感到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坐在客厅，可以看到宅前的小小院落，和煦的春光洒满了庭院，绿茵茵的草坪和几株灌木充满着勃勃生机。宾主正在畅谈时，几只椋鸟（即“白头翁”）飞落到草坪上觅食，大家立刻被这几只可爱的“不速之客”所吸引。中岛夫人告诉我们：“每年入春，这些椋鸟都要飞到我们家的庭院里，我们从不吓唬它们。”白土先生说：“椋鸟知道中岛先生是和平人士啊！”客厅里顿时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中岛健藏先生说：“现在东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何不到外面去赏樱？”

中岛夫人亲自驾驶汽车把我们带到东京郊区的井之头公园。这个公园距离嘈杂的东京市区较远，而且保留了许多自然景观，很少有人工的痕迹。在公园门口，白土先生的夫人正在等候着我们。

阳光明媚，这是日本的春天少有的好天气。我们步入公园，穿过大片树林往前走，忽然眼前一片明亮，湖边上千树万树的樱花，一团团，一簇簇，像一片无垠的雪海。那灿如云霞、妩媚多姿的樱花倒映在微波粼粼的水面上，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享受。我们在园中漫步，微风吹来，绯红的樱花轻轻地飘落，有如雪花飞舞，真是遍地落花雪，不忍举步行。我过去也多次赏过樱花，但这次看到的樱花不知为什么显得那样的美，那样的绚丽多彩。我们从心里感谢中岛先生和夫人为中国朋友所做的这一精心周到的安排。

中岛健藏先生从1956年3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时起就一直担任理事长。他告诉我们：“我本来是学法国文学的，而且从战前就在东京大学长年教授法国文学和法文。直到1957年访问中国以前，我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一个过去跟中国从未有过任何来往和接触的人，为什么担任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投身到日中文化交流和日中友好的事业中去了呢？中岛健藏先生说这与他在二次大战期间的一段经历分不开。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陷于泥潭后，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几天以后，中岛先生突然接到日军的“征用令”，命令他立即到大阪的师团司令部集中。翌年2月，他被送到当时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新加坡，给他的头衔是“文职人员”。在新加坡期间，他走在街上不只一次地被年老的华人妇女叫住，妇女手中拿着一张年轻人的照片，并用汉字写着：“这是我的儿子，自从发生战争以来，不知他的去向。你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使中岛先生意识到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可能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久以后，他听说日军为了抓抗日分子，便以发“良民证”为借口，把居民集中起来进行“甄别”，并把约一万名无辜的青年赶到海岸，用机枪扫射，全部秘密杀害。当他知道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时，精神上

受了很大的打击。中岛先生说，他当时虽然没有到过中国大陆，但到新加坡来，使他认识到了日本所进行的“圣战”的真相。等到战后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暴行被揭露出来，就更增加了自己的苦恼，而且这一苦恼竟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逐步产生了一种信念：日中关系的好坏将决定日本未来的命运。

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领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访华，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签署了协议书，其中就包括要开展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内容。片山先生回国后便筹备成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他被推举为会长，中岛健藏先生被推举为理事长。中岛先生说，他这时发现自己坐上了新的火车头，而且已经答应人们要做一名从头学起的日中文化交流的火车司机。中岛先生认为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所谓打开日中关系，就是要变革当时的现状。为此需要前卫，但前卫总是少数，要使前卫变成一大力量，就需要有后卫。自己要自觉地担任后卫，而这就是为什么答应做理事长的理由。

中岛健藏先生说：“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学习过欧洲而不了解中国的人来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曾经想做的事，现在已经来到了眼前，如果不做，我就将白活一辈子。在日本有那么多的朋友希望我做这项工作，我就越发感到必须全力以赴。我把它作为毕生的工作，因此我感到很愉快。如果用唐代渡海来日本的鉴真和尚所信仰的佛教的话来说，便是‘因缘’。现在帮助和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充满信心。”

自从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以后，中岛健藏先生就更忙了。他不仅继续担任东京大学的讲师，而且在日本文艺界兼了许多职务，他既要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还要挤出时间进行写作，但他对日中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在日本国内进行协调、组织和推动，而且经常来往于东京、北京之间，同中国方面共商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前，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国文艺界和学术界知名人士——楚图南、周扬、阳翰笙、巴金、刘

白羽、老舍、冰心、赵树理、林林、杜国庠、梅兰芳、欧阳予倩……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郭沫若、廖承志等也多次会见过中岛健藏先生。记得中岛先生和夫人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八大”后来北京访问，新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当时是我做翻译。

由于我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时间较长，亲身感受到他对这本月刊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一直很关心它的成长。可以说，在那场“史无前例”以前，他每次到中国来都要为这本刊物做些事情，不是发表文章，就是出席我们组织的座谈会或对话。

1962年9月，中岛健藏先生为了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活动来到北京。《人民中国》编辑部请他与当时也在北京访问的日本著名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进行一次对话，并把对话的记录发表在《人民中国》杂志上。对话的时间定在10月8日上午，但“天有不测风云”，当中岛先生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北海公园预定的地点时，我们突然接到电话说有吉女士病了，不能赴约。当时编辑部负责人康大川带着我正在北海公园具体安排这次对话，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从编辑部来说，由于未能按计划请来对话的对象，只得向中岛先生道歉，但中岛先生却热情地表示没关系，并立刻答应改变计划，与康大川先生进行对话。谢天谢地，真是“救场如救火”！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对话是在北海公园“仿膳”的二楼一间大厅里举行的。从我们落座的地方隔窗可以望见笼罩在晨雾中的宁静的湖水和岸边的柳树，此情此景，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

中岛先生首先从他访华获得的印象谈起。他说：“我非常喜爱北京。北京是一座宁静的绿色都城。1957年访华，我第一次参加国庆典礼，感到中国举国上下普天同庆，群众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国庆游行很壮观，而我最喜欢和最受感动的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的游行队伍，因为少年儿童肩负着中国的未来。”

中岛先生高兴地说：“我到中国来，一点儿也没感觉像是到了外国。

每年我的中国朋友都在增加。每每有中国代表团到日本来，我就交上一批中国朋友。代表团中有的老朋友，有一些则是新朋友。通过参加宴会等活动，我又可以结识一批新朋友。”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想我一定能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我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朋友，所以我对中国有一种超过常人的亲切感。”

中岛健藏先生谈到中日文化交流时说：“文化的范围很广，但应当先从见效快的事做起。就拿艺术领域来说，中国的艺术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非常丰富。日本文化在世界上也算是古老的，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日本虽然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但是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日本学了中国文化，又培育和发展的自己的文化。”

谈到文学方面的交流，中岛先生说：“过去日本翻译了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赵树理等人的不少作品。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就被译成日文，我还为它写过书评。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也译成了日文，在日本拥有很多读者。另一方面，我每次来中国时都带上十几本日本的代表作送给中国作家协会，请他们组织力量译成中文。”

他说：“中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古的，还是今的，在日本都有翻译，这是‘两条腿走路’。古典作品，如唐诗，在日本人的眼中被视为如同日本人自己的古典作品。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发展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我相信今后日中文化交流会越来越频繁。”

我从1964年秋常驻日本做记者工作以后，跟中岛健藏先生接触的机会比过去更多了，有时还应邀到中岛健藏先生家里作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放在客厅木柜上的那个装饰瓷盘，上面是楚图南先生挥毫书写的老子的话：“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过新年时，他和夫人常常把中国驻日人员请到家里，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度。这时，少不了夫人亲自下厨房做日本传统的年饭“御杂煮”（年糕汤）来款待我们。

中岛先生是日本知名的评论家和学者，不消说，他的藏书之多是惊人的，从楼下一进门到楼上，从走廊到过道，都放着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门类的书，从文学到医学、机械学等，应有尽有，可见他涉猎之广。中岛先生的爱好也是广泛的，他喜欢摄影，不管走到哪里都携带着照相机。记得在他家楼下的一间屋子里，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是旭日东升、满天彩霞的天安门广场，一位新中国的妇女迎着太阳正在广场上行走。这张照片不仅艺术性高，思想性也强，也充分表达了中岛先生对新中国的热爱。中岛先生还喜欢搜集邮票和石头。他还有一间小小的工作房，里面有老虎钳、螺丝刀及各种工具，平时工作累了时便到这里来做一点儿什么或修理一点儿什么，换换脑筋，休息一下。中岛先生家有一架钢琴，据说夫人不仅会弹琴，而且曾学过声乐。中岛健藏先生是音乐的行家，他喜欢欣赏音乐，还常常撰写音乐方面的评论。

由于中岛健藏先生在白天和晚上要从事社会活动，他的写作只能安排在午夜到天亮的时间进行，因此每天上午他需要休息。我们知道他的这一生活习惯，所以上午从不打扰他。我在日本做记者时，每当国际上或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需要采访日本各界人士发表谈话。为了不更多地占用被采访人士的时间，这种采访常常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每次请中岛先生代表日本文化界发表谈话时，我们都是下午打电话到先生家里，并由夫人协助安排。

中岛健藏先生1903年出生于东京。除了小时候随父亲到北海道住过一段时间外，一直生活在东京，所以他是地道的“老江户”，说起话来是典型的“江户腔”，不仅保持了东京方言的味儿，而且速度极快。他在集会上讲话时从不摆架子，而是用令人感到亲切的“江户腔”讲话。有时欢迎访日的中国代表团也拿稿子讲话，但讲话稿差不多都是他亲自执笔的。我作为记者，为了发稿时准确起见，在他讲完后便向他借讲话稿，而他每次都会很爽快地借给我。对中岛先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中岛先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陷于极大的苦恼之中，他到中国来见不到想见的老朋友，感到非常寂寞。当时日本的日中友好力量出